联合国 TD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B/52/7
14 Sept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5 年 10 月 3 日至 14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2

1990 年代的增长和发展——一个令人困惑的十年给予我们的教训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

* 本文件因程序原因在上述日期提交。

GE. 05-51976 (C) 270905 270905

A. 对增长进行管理：一个相互依存世界中的积累和结构变革

1. 无论发展经济学家有哪些其他分歧，但他们大致同意，迅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解决赤贫问题的必要条件。正如 80 年代初一本主要发展教科书所指出的，自称已找到经济增长奥秘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骗子，或两者兼而有之”(Herrick 和 Kindleberger, 1983：xvi)。尽管各种新的、复杂的增长模式和相关经验后来纷至沓来，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前团长还是指出，“基本的理论、理性的观察和常识(Mankiw, 1995： 308-9)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可靠的指导。

2. 审视今天先进经济体的经验，包括东亚的最新经验，可以看到一个明智的启示：广泛而牢固的工业基础是取得成功的可能条件。[1] 规模经济、专业化和技术的收益、有利的需求条件是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说明建立先进工业部门和培养相关技术能力为什么能够有力地促进收入和生产力的增长。

3. 然而，对这些经验的理性观察不难发现，工业发展的时机、步伐和内容千差万别，反映了资源禀赋、规模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工业化取得成功的体制安排并无统一的模式，折衷和灵活是政策环境的特点，措施需要符合当地的经济情况以及迅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取舍和偏重。

4. 设法照搬他人的“蓝图”或追随最佳做法，不可能为期待加速增长的决策人提供正确的指导。虽然这样说，但在构成良性增长机制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资本积累似乎是从工业起飞到追赶和维持增长的一个重要衔接。投资可同时产生收入和扩大生产能力。也可以与增长进程的其他要素如技术进步、技能获取和体制深化形成有力的相互补充。由于投资决定对经济活动水平和稳定的敏感性，它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长期性特点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2]

---

[1] 自然资源开发是促进还是阻碍增长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历来持有不同意见，见 Sachs and Warner, 1995； UNCTAD, 1996, 139-142； and Mayer, 1997。

[2] 从 Rodenstein-Rodan、Rostow 到 Hischman 和 Tinbergen 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当然都强调资本形成作为政策指导的作用；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随着重点转向价格扭曲问题，这一作用被忽视，“总要素生产力”成为增长实践的焦点。但是，最近讨论“投资环境”和“增长诊断”问题时，似乎又有点回归到这一正式的论点。详见 UNCTAD 2003: 61-63; Reati, 2001, 对“总要素生产力”概念的批评。

5. 一定积累速度依其性质和构成以及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而产生不同的增长率。这是计量经济研究为什么无法在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建立一种对等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3]

6. 强调投资将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企业和企业与国家的互动，包括公共投资是否和如何带动私人投资。但是，在讨论推动资本积累进程的各种力量中，社会最富裕阶层获取和使用收入的方式似乎十分重要。大量的经验表明，经过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后，当农业收入是投资的主要来源时，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公司保留下来的利润，而不是家庭储蓄，再加上银行长期借贷。这种利润与投资关系为寻求较快速增长的政策设计提供一个重要平台。[4]

7. 出口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和增长战略的第二项内容，尽管对其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出口是通过更大的竞争提高效率；在另一些方面，则涉及市场规模的优势，或是通过较复杂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收益、技术提升或是通过最低生产规模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后一些要素中，出口制成品带来了能动的优势。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只是权宜之计，由于国内没有资本货物生产部门，为快速增长所需进口提供资金便不可避免地遇到支付问题。

8. 但是，成功的出口本身依赖于有利的投资势头。随着收入增加，劳动成本提高和较低成本生产者的进入，可能迅速侵蚀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竞争力，需要新的投资来维持生产力增长，并提升技术向从较高附加值的活动转移。这种出口与投资的联系为思考增长政策提供了第二个平台。[5]

9.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将产出、贸易和就业结构转向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但市场力量的迅速自由化能否立即使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发生相互强化的关联，是否需要国家积极干预解决阻碍这一进程的相关体制和结构问题，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争议。这种争议对有关全球化机会和挑战的辩论具有重大影响。当然，生产、消费和金融活动的跨境联系的力量现在相当强大，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境外经济决策的影响。不过，市场和技术已最终脱离国家资源禀赋、体制结构和政策选择的观

---

[3] 见 Levine and Renelt 1992; Ros, 2000; Bosworth and Collins, 2004。

[4] 见 UNCTAD 1995, 1997; Singh, 1998; Ros, 2000; and Amsden 2001.

[5] Rodrik, 1999。详见 UNCTAD 1996 and 2004; Bosworth and Collins, 2003, 报告支持出口与投资关联的计量经济学证据。

念似乎过于牵强，某些发展中地区不愿意面对全球竞争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的说法也是对过去十年左右主要发展趋势的曲解。

B. 1990 年代增长和贫困的基本情况

10. 发展中国家经过 20 年的强劲和持续积极增长后，1980 年代开始出现一系列“减速和低迷”(Ben-David 和 Pappell, 1995)。发展中国家年平均增长率急剧下降，稍高于人口增长；10 年中有 5 年人均收入缩减。按广义贫困标准(2 美元/日)测算，1980 年代贫困人口绝对人数骤增；但按狭义标准(1 美元/日)衡量，头五年开始时有所下降，后来稍加扭转。

11. 总体数字可能产生误导。不是所有地区在 1980 年代都迷失了方向。危机仅限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每个地区都有些国家逆趋势而为。对比而言，东亚和南亚增长强劲，有些国家比 1970 年代速度还快。贫困趋势并行分离。按狭义概念，东亚贫困率剧降，而其他地区的贫困人数则持续增长。

12. 尽管工业化国家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发展中世界的债务危机(贸发会议，1986)，但也反映出快速增长如何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对许多国家而言，危机最终证明，内向型增长战略和干预性政策无法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不发展的泥沼。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的迅速自由化与世界经济密切接轨，是消除阻碍增长的结构和体制障碍、减少债务延伸和结束周期性国际收支失衡的出路。

13. 即使 1980 年代低估了适应这条新发展道路的代价，但 1990 年代仍可以通过符合市场基本规律的较强劲增长获得回报。事实上，由于更大程度的开放、较少的国家干预和私营部门的更大作用预期将为贫穷国家带来最大的增长“红利”，所以收入趋同将是本十年的主要趋势。[6]

14. 1990 年代，货物、服务和投资流动全球一体化当然发生了重大进展。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产出，1990 年代更形扩大，发展中国家走在前列(贸发会议 2003：41-44)。结果是，进出口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

---

[6] 趋同的思想失去了作此预测的第一代新古典增长模式的青睐，详见 Kozul-Wright and Rowthorn, 2002。

占的比例普遍迅速提高,在国际货物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亦不断增长,从占总数约 23% 增加到 30%。外来直接投资的数据更为惊人。年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额 1990 年代几乎比 1980 年代多五倍，从占全球流入额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收入份额增加了四成。

15.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业绩平平，人均年增长率虽略高于 1980 年代，但仍大大低于 1970 年代。而且，复苏的同时对外赤字严重恶化(贸发会议，1999：75-94)。增长也十分不稳定，多数地区出现了“繁荣－崩溃”的周期。四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比 1970 年代取得了更佳增长业绩，而且多数在东亚；如果排除东亚国家，1990 年代比 1980 年代增添了更多的贫困人口。这一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尖锐。在那里，1990 年代末人均收入比 1980 年代下降 10%，又有 1.15 亿人加入到极端贫困行列——1990 年代约超过 5,000 万，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贸发会议，2000a, 表 20)。

16. 尽管 1990 年代先进国家的增长进一步放缓，但收入差距扩大，趋同并没有实现(贸发会议，1997：69-101)。不过，较乐观的情况是中国和印度的强劲增长，两国加在一起促使 1990 年代发展中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7] 在这两个国家，有力的投资和出口活动反映了更大的市场作用。两国经济趋势的改善都始于 1980 年代初，都避免了传统调整方案的冲击。有力的和非传统的政策干预是适合当地情况的“非正统渐进主义”成功品牌的一部分(Birdsall, et al, 2005：145)。

C. 1990 年代的各种发展经验述评

17. 世界银行(2005：30)近期对 1990 年代所持政策方针进行评估时承认，它持续高估了实行调整方案地区的增长前景，低估了未执行调整方案的增长业绩。报告还承认，要加速增长，公式化的决策方法需要让位于有针对性地对具体国家的增长问题进行诊断的做法，同时认真注意资本积累、结构和技术变革以及不平等。

---

[7] 关于这些国家贫困人口的测算和如何影响全球数字，见 Berry and Serieux, 2004, and Sutcliffe, 2004。

18. 但是，1990 年代忽略发展政策挑战的这些方面造成了哪些后果呢？首先，1980 年代经历过调整的地区发现扭转投资份额急剧下降的局面尤其困难，在有些国家甚至降低到更换折旧资本所需的水平以下。实际上，在调整方案持续实施的国家，投资周期波动很大，即使在债务危机的直接扰乱消失以后。这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出现的情况。对比而言，1980 年代逆趋势而上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在 1990 年代的多数年份设法维持了快速稳定的资本积累速度。

19. 在 1980 年代工业产出扩展的国家，这一趋势 1990 年代继续下去。相比之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工业活动停滞不前的地区，大多数国家发现 1990 年代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实际上，“去工业化”在一些国家已十分明显(贸发会议，2003：92-99)。在投资和制成品附加值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的经济体，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或停滞或下降，尽管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总构成仍在迅速转向制成品，包括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区域之间的差别亦非常惊人：1990 年代，8 个东亚国家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的 70%。在这一集团之外，出口战略依赖于低工资(或不断下降的工资)或货币贬值，而不是依赖于有力的生产力增长。虽然由此刺激了某些国家的复苏，但没有多少国家能够达到具有活力的工业化道路所需要的出口极限水平(贸发会议，2003：99-102)。

20. 作为减贫关键因素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也各不相同。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往往与失业率提高和技能与非技能工人工资差距扩大同时出现(劳工组织，2004：40-45；Akyuz et al, 2005)。在许多情况下，调整政策和公共部门裁员致使中产阶级出现空洞化。与这一趋势相对应的是非正规经济的扩大，到 1990 年代末已占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劳动力队伍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三。

21. 纵观 1990 年代的这些趋势，可以发现暴露于全球市场力量的程度似乎不是区分“赢家”和“输家”的标准。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化发生于成功执行工业和贸易政策之后；消除保护和支持，主要是因为它们已不再需要。在后者，引发自由化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在劳动和/或技能密集型部门建立起有效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开放市场引起的激烈竞争对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非常不同。

22. 虽然某些历史和地理特点在这种不均衡绩效中起到一定作用，但对资本构成、出口业绩和工业化趋势的比较分析后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发展中经济体 1990 年代结束时的各自情况。

(a) *成熟工业化者*：这一组包括第一层次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主要是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它们通过快速和持续的资本积累以及工业就业、生产力、产出和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已在工业上趋于成熟。1990 年代，这些经济体的工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先进国家的水平，出口已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但随着资源向服务部门转移，工业增长开始放慢。

(b) *迅速工业化者*：一些国家由于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活动中大量投资，使制成品在总产出、就业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并开始产业升级，转而生产中等技术产品。这一组包括第二层次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其他地区的一些孤立的成功者，以及正在醒来的巨人——中国和印度；

(c) *“飞地”工业化者*：一些国家由于与国际生产链联接，又通过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主要依靠进口投入和机械，已摆脱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它们的出口增长往往很快，如菲律宾、墨西哥以及摩洛哥。然而，投资、附加值和生产力增长方面的总体表现常常不佳。

(d) *过早去工业化者*：这一组包括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曾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但无法通过迅速积累和增长维持激烈的结构调整过程。在快速自由化过程中，通常的趋势是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所占份额下降，并开始转向较低技术密集型的活动；

(e) *依赖商品的出口者*：许多贫穷经济体，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体，仍然严重依赖于一种或两种初级商品出口。面对不景气的市场、波动的价格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投资进一步下降，多样化停止，生产力踟躇不前。虽然有些国家出现了通常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较快速增长的采掘部门，但它们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接很弱。不过，智利等一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取得了较快速的投资和增长速度。

D. 国际环境：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和一体化

23. 1980 年代初期对发展政策方向进行调整时认为，内向型发展可快速转为较具活力的外向型发展。竞争性市场可确保按照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获取出口收入进口资本和中间货物，以保证快速增长。金融自由化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资本稀缺国家寻求高回报，使它们进行投资而非储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可转让技术和管理技能，同时带动国内投资。

24. 然而，虽然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全球宏观环境 1990 年代可能有所改善(世界银行，2005：59-71)，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引擎运行得十分吃力，而且没有能够振兴增长。

25.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自由化格局的偏颇，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些部门形成了歧视，损害了增长情景，因为它们向贸易体系的弱小参与者释放出不均衡的市场力量(贸发会议，1999；劳工组织，2004)。1990 年代，许多国家的贸易量很大，收益却很少，这一事实表明正兴起的一体化格局存在着某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26. 许多商品生产者的经历，是我们非常所熟悉的：持续严峻的外部条件，如疲软和波动的价格、高负债水平和停滞或不断减少的官方发展援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投资不振，多样化停止，人们长久生活在贫困的陷阱中(贸发会议，2003, 2004)。很明显，大多数调整方案没有能够改变 1990 年代这种融入全球经济的模式，有的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进程，当然是一种倒退。

27. 然而，1990 年代，初级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这是 1980 年开始的趋势的继续，不断提高的制成品份额中已包含中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新增外国直接投资中很大部分是为了将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国家，然后再向跨国公司的母国和第三国的市场出口。

28. 服装和电子产品等受青睐部门包括贸易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产业。高收入弹性、产品创新和消费模式的变化，都助长了这种活力。即使最后产品被认定为高技术产品，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只是利用进口资本和中间产品从事低技能的装配活动，它们对附加值的贡献取决于最不缺乏和最薄弱的要素即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

29. 对国际生产网络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此种参与，即使产生的附加值不高，也可协助各国增加就业和人均收入。但是，与经济其他部门的后向和前向联接常常很

弱。由于这些产品的最后市场由凭借质量、设计、销售、品牌和产品差异进行竞争的寡头企业垄断着，进入生产链高技能和高技术部门的壁垒重重，不仅扭曲了贸易收益的分配，而且使升级变得尤其困难。所以，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因为它们的生产者发现升级和多样化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同步的出口活动可能造成标准化规模产品的生产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抑制工资的增加。1990 年的趋势表明，这些危险是真切存在的(贸发会议，2002：113-140)。

30. 1990 年代的经验，特别是一般经济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扩大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样，资本，特别是“绿地投资”也在可持续和长期流向那些已实现迅速经济增长，并在人力和物质基础设施上不断改善的国家。对于那些在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上大量投资的经济体，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强化既有的良性增长循环。否则，这些力量则可能导致边缘化和/或“飞地”类型的发展。

E. 国际环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流动

31. 由于放松管制、国际化和创新，富国和穷国的金融市场都在 1980 年代初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虽然变革的冲动来自发达国家，但按经济逻辑对世界最贫穷国家也预示着很大的希望。取消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不仅可以增加国内和外国投资资金数量，而且可以创造更加稳定和健全的投资环境，使赤字国家摆脱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的不可预测性。[8]

32. 1990 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迅速扩展，比 1980 年代的平均数字增长七倍。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十分强劲，占私人投资总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激增多半是 1980 年代萎靡年份以后的趋势回归。[9] 而且资金越来越集中于 20 几个新兴市场，它们吸收了 1990 年代全部资本流入额的 90%以上，而债务

---

[8] 根据所谓的“劳森理论”，私营部门(而非公共部门)产生的经常帐户赤字和对外负债的增加，不会重复 1980 年代初期那种破坏性的危机。然而，对历史趋势略加观察便知道需要谨慎从事。见 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

[9] 1990 年代资本年流入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约与 1975-1982 的水平相当。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一比率实际上比前一时期低一个百分点。

危机爆发前为 50%。更重要的是，以有利于快速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的角度对这些流动进行管理愈加困难。

33. 对于在债务危机后寻求重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较高的实际利率和稳定的货币是先决条件。虽然银根紧缩可吸引外国投资者，但货币和财政政策趋紧无益于激励国内投资或改善出口前景。实际上，高利率引起的偿债义务增加，加上出口前景暗淡，有可能再度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在许多情况下，资本外流、利润汇出和外汇储备积累大大减少了资本净流入，而其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又用于不增加生产能力的活动。这些资金尤其以短期贷款和证券投资的形式出现，极不稳定，是不可靠的发展资金来源。

34. 随着金融市场日益与工业化的长期需求脱节，不受管制的资金流动引发了繁荣—崩溃的周期，成为发展中世界 1990 年代一个经常现象。资本流入逆转的可能性及其对增长的影响的确切背景，各地区不尽相同。1994 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只是一次预警，它的全部力量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才充分显现出来(贸发会议，2000)，而这一地区有着强劲增长和良好财政纪律的长期记录。与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动荡情况一样，东亚危机之前也是金融自由化和取消管制，有时与过去的做法基本决裂(贸发会议，1998：53-77)。而且，崩溃的极端现象又被不必要的货币紧缩政策所放大，加深了债务紧缩进程，进一步抑制了生产和就业，对公司和金融部门造成了严重扰乱(Stiglitz, 2002)。

35. 虽然 1990 年代在整个发展中世界都可以听到金融自由化的呼声，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吸收的私人投资很少，当然不足以弥补减少的援助(贸发会议，2000)。私有化和取消管制吸引了一些外国直接投资，尽管主要是流入采掘业或用于购买公共事业。这些流入无益于缓解支付困难，通过鼓励新资本流入用以弥补跨国公司活动外汇赤字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F. 某些事关重大的问题

36. 由于存在结构弱点，国内市场小，又依赖进口实现能力利用率和积累，穷国能否产生必要的资源以激励增长和减贫，多半仍依赖于如何将未利用的自然资源和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出口收入、进口和投资。在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不断增加的世

界中，这样做涉及更加复杂的政策挑战。迎接挑战的责任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但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运作的不平衡、不协调和偏颇严重阻碍了它们的努力。

37. 1990年代的经验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债务危机后确立的政策方向，尽管废除了以前的体制，但却没有建立起具有生命力的替代体制。政策执行的失误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设计。宏观经济、贸易、工业和金融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无益于鼓励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而同时又释放出全球竞争的力量。

38. 最近更加强调减贫多少是因为过去十年令人失望的成果，现行多数政策咨询意见继续包含旨在“恢复价格真面目”的第一代改革的主要内容。虽然对机制因素更加敏感，但重新重视减贫必须建立在认真和坦率地评估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政策对增长、分配和贫困的基础上。

39. 1990年代的成功不断地强化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成就。所有情况下的一个关键特点都是，有余地利用各种政策选择管理与全球经济的接轨，确保将更多的贸易附加值留在国内，同时试行各种更具战略性的措施，鼓励有力的资本形成，扩大国内市场，支持技术升级。

40. 总结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不意味着轻视金融不平衡或通货膨胀压力的威胁，而是承认可通过多种方式实行宏观经济的稳定、一体化和快速增长(世界银行，2005)，也就是以建设性观点看待国家在资本积累、工业发展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通用型”方法应该让位于充分讨论如何给予所有发展中国家以根据具体国情制定自身政策的必要空间。

41. 善治不是有限政策干预的同义词，也不是整治私营部门。它更多的是加强有利于增长的各种机制，为经济活动特别是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可预测的激励，改善参与投资的各利害关系方之间的直接对话，规范阻碍更大发展事业的利益集团(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行为。今天的成功经济体都能够发展这种符合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并适合地方精英的管理和企业能力的机制。

42. 1990年代，发展不平衡、债台持续高筑和金融危机，表明现有的全球安排没有提供所需要的资金和货币稳定，维持发展中国家就业和产出的扩展。一个主要问题是贸易、债务和金融之间互动产生的扰乱和通货紧缩。

43. 新兴市场几乎所有的重大危机都与发达国家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变化有关。混乱的汇率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虽然仅限于这些经济体，但发展中国家负债国也难以幸免，它们较多地依赖于贸易，对外借贷使它们承受很大的货币风险。布雷森特体系崩溃后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国际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

44. 任何此类改革，都需要优先确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行为者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由于现有监测做法的不对称，一种办法是将其与类似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可以兼顾各方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影响的异议，并寻找解决办法。同样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管理资本流动和选择合适的资本帐户制度上有适当程度的政策自主。根据经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一个基本目标应该是尽力消除金融资本对贸易、工业和就业的控制。

45. 现有安排无法使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的长期支付困难。八国集团最近承诺将援助增加一倍，还提出免除全部债务(仍是倡议)，是援助最贫穷国家的正确方向。然而，经验继续表明，金融市场往往无法应对新兴市场的这一挑战，因为它们常常是周期性的，又受制于投机和趋众心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贸易和金融环境更加不稳定，可试图通过有效的改革为贸易和其他货币交易提供更多的反周期性的紧急资金。

46. 在贸易方面，挑战依然是促使多边体系更有利于发展。判断成果的标准是能否改善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市场准入，又不过分限制其促进增长的政策选择。从乌拉圭回合中汲取的教训之一是开放可能带来巨大代价以及利益，对最贫穷的国家尤其如此。金融支持和差别待遇的某种结合可确保在开放中能够减少贫困。

47. 发展中大国可能更有条件应对这些压力。实际上，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增长资源的同时，外向的程度可能减少。但许多小国仍严重依赖于出口，扩大南南贸易和投资可能符合共同利益。目前正在努力制订适当的安排，需要国际社会全力支持。但不应该认为由此将不需要改善北方市场的准入，北方贸易体系的一些严重问题继续阻碍着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Akyuz, Y et al (2005).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labour markets. Mimeo, UNCTAD, Geneva.

Amsden, A (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David D and Pappell D (1995). Slowdowns and meltdowns: Post-war growth evidence from 74 countri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111, February.

Berry A and Serieux J (2004). All about the giants: Probing the influences of world growth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ESifo Economic Sudies, 50, no.1.

Birdsall N et al (2005). How to help poor countrie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Bosworth B and Collins S (2003). The empirics of growth: An update.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Herrick B and Kindleberger C (1983). Economic Development, 4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LO (2004).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LO.

Kozul-Wright R and Rowthorn R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myth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e appliqué, vol. LV

Kregel J (2004). External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ability. G-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32.

Levine R and Renelt D (1992).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Mankiw G (1995). The growth of nat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er J (1997). Is having a rich natural-resource endowment detrimental to export diversification? UNCTAD Discussion Paper, No.124, March.

Reati A (2001).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a misleading concept. BNL Quarterly Review, 218, September.

Rodrik D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Essay No.24,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Ros J (2000).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achs J and Warner A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Schneider F (2002). Siz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1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aper presented at an Australian National Tax Centre workshop, Canberra, July 17.

Singh A (1998). Savings, investment and the corporation in the East Asian miracl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4 No. 6 August.

Stiglitz J (2002).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Sutcliffe B (2004).World inequality and globalisa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apers, 20, no.1.

UNCTAD, various years.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Geneva, UNCTAD.

(2000a). Capital Flows and Growth in Africa, Geneva, UNCTAD.

(2002a).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 Geneva, UNCTAD.

(2004).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 UNCTAD, Geneva, UNCTAD.

(200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thinki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eneva, UNCTAD.

O`Rourke K and Williamson J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19th 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MIT Press, Cambridge.

World Bank (2005).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 -- -- --